



# 目 录

序言	杨国桢	1
<b>第一章 绪言</b>		1
<b>第二章 佛山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b>		12
第一节 独步岭南的泽国沃壤		13
第二节 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		19
<b>第三章 明代佛山冶铁业的兴起与都市社会的初步形成</b>		29
第一节 明初乡族社会的发展与佛山社区的形成		29
一、外来氏族的定居与“八图”的创立		30
二、龙龕祠与九社的聚合		39
三、佛山乡族社会的权力特征		42
第二节 明代冶铁业的发展模式		46
一、私营采矿业的发展与佛山冶铁业的兴起		47
二、佛山的炉户及其经营方式		53
三、明代佛山冶铁业的历史地位		63

第三节 明代都市雏型的形成 .....	68
一、明初佛山堡的空间结构 .....	68
二、黄萧养起义与铺区制度的确立 .....	71
第四节 明代佛山的宗族组织及其发展形态 .....	78
一、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兴起 .....	81
二、霍韬重构宗族组织的模式 .....	96
三、佛山镇内宗族组织的重构与发展 .....	121
第五节 明代的文化教育组织与民间宗教的建构 .....	137
一、教育组织的建立 .....	138
二、社区文化活动的形成 .....	139
三、北帝神崇拜的建构与发展 .....	141
第六节 明末佛山的社会矛盾与新兴士绅集团的 全面整顿 .....	149
一、平民境况的恶化与“洗子平乱” .....	149
二、大族把持经济与工匠的鼓噪 .....	152
三、李待问新兴士绅集团的全面整顿 .....	154
<b>第四章 清代佛山商品经济的综合发展与都市的繁荣</b> .....	188
第一节、手工业生产的综合发展 .....	189
一、清初的国内外形势及对佛山的影响 .....	189
二、有机结合的手工业结构与华南综合性生产基地 .....	196
第二节 商人的涌现与中心市场地位的确立 .....	218
一、商人与商人资本 .....	218
二、中心市场地位的确立（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 .....	237
第三节 都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人口的发展 .....	255

一、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与城区的扩展 .....	256
二、二十七铺的区位功能与三大区划的形成 .....	260
三、城区人口的发展及其职业构成 .....	275
<b>第五章 清代佛山社会结构的演化与都市社会的</b>	
<b>重新整合</b> .....	297
<b>第一节 外来商民与土著居民的利益冲突与调适</b> .....	298
一、侨寓人士迁佛的洪潮 .....	299
二、侨土冲突与“三大案”的解决 .....	305
三、田心书院与侨寓组织 .....	311
四、侨寓人士地位的上升 .....	314
<b>第二节 清代佛山的宗族组织及其变化</b> .....	320
一、宗子制度的废止 .....	320
二、尝产形态的变更 .....	322
三、价值观念的演进 .....	324
四、宗族组织的解体 .....	327
<b>第三节 经济组织的双重分化与发展</b> .....	331
一、会馆的发展与结构 .....	332
二、会馆的组织与功能 .....	341
三、手工业行会的分化与整合 .....	347
<b>第四节 政治组织的多元分化与调适</b> .....	355
一、士绅与大魁堂对佛山权力的控制 .....	355
二、八图公馆与土著居民利益 .....	377
三、文武四衙的设立及其社会意义 .....	385
四、民间自治系统与官府权力系统的抗衡与调适 .....	393
<b>第五节 教育组织与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发展</b> .....	399

一、书塾、社学、书院与佛山科名的鹊起 .....	400
二、喜庆活动与社区关系 .....	407
二、琼花会馆与粤剧的诞生与发展 .....	418
第六节 祖庙与清代佛山社会的整合 .....	423
一、北帝崇拜的登峰造极 .....	424
二、多重祭祀圈的形成与发展 .....	428
三、祖庙的祭祀仪式与佛山社区的内部关系 .....	442
<b>第六章 结语——佛山模式的总结</b> .....	<b>488</b>
<b>后记</b> .....	<b>497</b>

## 第一章 绪 言

城市<sup>〔1〕</sup>，作为相对于农村的人类生息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都市是人类最重要和最完备的生活环境。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亦说：“我们必须视我们的都市不仅是人口的中心，而且是文明的工厂。”法国历史学家史宾格拉（Oswald Spengler）甚至断言：“所有伟大的文化全是都市的产物”。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一个时代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的渊藪和焦点，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同时，城市也汇聚了整个社会生活和时代所具有的矛盾，这些矛盾交错和迭加、消弭和激化，使城市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发展面貌，也使城市研究充满了诱人的魅力。

佛山，是中国古代“天下四大镇”和“天下四聚”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工商城市，明清时期曾经以出产精美的“广锅”而誉满天下。时人“春风走马满街红，打铁炉过接打铜”、“汾江船满客匆匆，

“若个西来若个东”的诗句，就是对佛山工商业盛况的生动写照。佛山在工商业上的成就，自然决定了她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佛山所具有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佛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传统型城市，是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在其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外来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微乎其微，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因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研究佛山都市化的过程及其社会结构的变迁，还有助于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内在结构的理解和传统中国城市发展趋向的把握。此外，佛山还集中了岭南传统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它们五色杂陈，大放异彩，其典型性远胜于广州，这又使研究佛山的文化现象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本书将对佛山都市化过程从时空上进行纵横考察，揭示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化过程中的整合意义，从而建构一个传统型工商城市的发展模式。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扼要地向读者介绍自己的学术追求、佛山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本书的基本思路。

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向所注重的是城市地理和城市经济的研究，一般而言，对春秋战国前的城市研究是在古都学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比较注重城市区位、建置的研究。对春秋战国以后的城市研究则注重城市经济的研究。注重城市经济的研究曾使城市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光注重城市经济的研究还不够，至少它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研究局限在经济活动，尤其是物质交流的描述中，而忽略了掌握

物质的人，即史学界常说的见物不见人，忽略了历史活动的主体——城市居民。二是容易夸大经济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孤立地看待经济发展，把一些历史上出现的新经济因素视为当时社会的对立面。例如有著者把春秋战国时城市经济成分的增加，视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也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的理论倾向。他们都把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因素，只要发现了商品经济因素，就视为封建社会正在发生质变的证据。

本人认为这种研究不能满足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实际的要求。我想城市史的研究，不应孤立地研究经济史，而应该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把经济活动、经济组织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下考察，既见物又见人。注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两者的互动关系，也就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探讨其长时段的结构变化。

佛山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本身至少体现了如下两点典型意义：一是佛山以工商兴城的发展模式，代表了宋以后传统社会都市化的主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曾经武断地下结论说，中国没有城市。他提出判断城市的五条标准，即是否具有要塞、市场、法律、结合体制和民选的行政权威。他认为中国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有城而无市，不是完全意义的城市。所以中国城市体系发展不足。尽管韦伯的结论有些偏颇，但宋以前中国的城市不是政治中心就是军事重镇，这一点的确如此。我国学者胡如雷也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都与政治因素和军事



因素相联系，它们是作为县治以上各级政权的所在地而存在，这种城市模式胡如雷称之为“郡县城市”。可以说因政治和军事因素而兴的郡县城市是宋以前中国古代社会都市化的主流。宋以后，随着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江南、珠江三角洲出现了都市化的现象。明清的江南市镇和岭南墟市，就是农村——城市续谱初始阶段的产物。它们的出现纯因经济的动因，即农业商品化导致的过剩人口增加，手工业发展引起的新聚居点的集中和老聚居点的扩大。从等级和规模来说，江南市镇和岭南墟市都属于都市化的起步阶段。然而，由于这一批小城镇的涌现，市场网络日趋发育成熟，客观上要求有更大规模的城镇来担负起区域性市场中枢的任务。于是号称“天下四大镇”的佛山、汉口、景德、朱仙脱颖而出。天下四大镇都不是县治所在，它们的兴起，不是因为手工业发展，就是因为商业发展；它们的出现打破了“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代表了传统工商城市发展的新道路，代表了此时传统社会都市化的主流。二是佛山的发展始终在传统社会结构制约下运行，有它自身的导向性。这是佛山模式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知道，韦伯是以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为范型来讨论中国城市。固然存在不足。而中国学者对江南市镇的研究也表现了这种理论倾向。一些学者试图论证江南市镇具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导向性，并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中国会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这种假说上。这表明中国学者也没有跳出以西欧自治城市为范型的分析框架。在佛山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各种因素是在互动中发

展：经济因素的增加，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和重新组合；而经济结构的改变又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变迁；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组织在传统社会结构下不断重组、整合，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即使是那些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如手工工场、雇佣劳动、包买商和西家行等，都没有转化为传统社会的对立因素，而是与传统社会整合得很好。因此，佛山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如同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进入资本主义，它仍在传统社会结构下运行，按着自身发展规律发展。这种发展道路，我想佛山决不是唯一的。如果作深入探讨，其它城镇或许也可以探测到佛山模式的共核。概言之，佛山走的是一条不同于郡县城市的发展道路，经济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以经济动因素发展起来的工商城市并非一定发展为资本主义式的近代城市，它有另一种导向性。传统的社会结构能容许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随其发展改变自己的结构。或许在这一点上，佛山更具有传统工商城市的典型意义。

佛山史的研究，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向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自 50 年代初以来，对佛山史开展专题研究并发表过著作的中外学者不乏其人，据笔其所知，中国学者有陈学文、彭泽益、徐新吾、林乃桑、李龙潜、谭棣华、王宏均、刘如仲、蒋祖缘、陈春声、冼剑民、高惠冰、赖达观等；外国学者有日本的笹本重己、片山刚、英国的科大卫、美国的 C·K 杨。他们的研究，为佛山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作出了贡献<sup>[2]</sup>。

我自 1982 年始从事佛山冶铁业研究至今，已历十载。10 年来，发表有关佛山经济史的论文 10 篇，与人合作出版《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一本（38 万字）。1988 年前，本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冶铁业、商业和商人、市场地位与功能三个方面。近年来，本人对社会变迁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尤其在 1988 年到厦门大学就读明清史以来，在傅衣凌先生所创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熏陶下，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和形态有比较完整的认识。三年来，师长的鞭笞策蹇，同学的互相砥砺，使我如捧甘露，受益良多。不知不觉中对佛山的社会结构有了新的认识。笔者认为，作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时间是一种整体社会现象，它表现了根据不同社会、不同时代而以不同方式结合的各个方面。人们在研究历史时要予以揭示的，正是这一系列方面的结合及其变化，佛山城市发展史，亦应该作为一个总体社会现象而加以研究。

本书试图通过考察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探讨中国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佛山的都市是如何形成的？佛山人在都市化过程中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何变化？佛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呈现出何种模式？传统文化在佛山是如何建构、并影响佛山都市社会发展的？这些，都是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本身是个复杂的集合体，任何一套主观臆断的特征概括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传统社会可以容许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可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改

变自己的结构。根据这一基本思路，本书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上来概括佛山的发展。城市史本身又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要在时间的流动中把握上述三大结构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中观的理论模式。笔者认为，有一条主线既能联系经济、社会、空间的三大结构，又能贯穿时空发展，这就是佛山都市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过程。

本书认为明清时期的佛山有过三次性质不同的社会整合，第一次发生在明正统年间，由乡老领导进行，这次整合使佛山的各个宗族在地缘关系上联系起来，佛山出现了城市的雏型，这是都市化的最初成果。第二次发生在明末，由新兴的士绅集团领导进行，这次整合击败了乡族豪强势力，使佛山权力结构转移到士绅集团，这是官方正统化和都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三次发生在清代前期乾隆年间，由侨寓人士与全镇商民联合进行，这次整合击败了土著的宗族势力，使佛山权力结构发生重组，利益也重新分配。这是商品化的结果。在每次整合之前，各有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安的酝酿时期，每次整合之后又都出现了经济繁荣发展的局面。这说明经济发展既是整合的原因，又是整合的结果。这种打破均衡和恢复均衡性的力量，在社会结构中产生了一种辩证的变化模式。

根据上述三次整合的主要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把握佛山城市的结构性变化。本书就是按照三次整合过程来建构全书的有关章节的。笔者希望本书所采用的这一分析构

架，能够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要求。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笔者主张理论概括和史实描述并存的研究形式，即史论结合的研究形式，那种为了拔高理论模型而强干弱枝和削足适履的做法，都有悖本书的主旨，本书希望读者能循着三次整合过程的递次发展，比较全面地了解佛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详细内容。在第一次整合过程中，笔者将考察佛山都市化的基本动因、明初乡族社区的权力特征、祭祀圈的形成和家庭小作坊的发展模式。在第二次整合过程中，笔者将展现在官准专利背景下的冶铁业的家庭式经营方式、各宗族的内部状况以及功名望族间令人惊讶的联姻状况及其宗族势力的隆替周期、新兴士绅集团的各种整合活动及其背景。在第三次整合过程中，笔者将描绘商品经济发展的面貌和市场地位上升的情况，展示佛山空间结构变化和特色，同时，还将着力于展现土著与侨商、作坊主与工匠、精英集团与劳苦大众的矛盾斗争与调适这一互动过程。此外，还将揭示佛山多样性文化生活和典型化的祭祀活动及其文化意义，讨论祖庙的社会控制作用。如果读者能够通过本书多少了解明清佛山城市的丰富画面，笔者将感到很大的满足。

本书根据的材料有三个来源：一是方志、族谱和地方文书。三套《佛山忠义乡志》和七套《南海县志》以及五套《广东通志》是方志的主要内容。现存佛山的族谱共有14种，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艺文志只记载7种，其中《吴氏族谱》笔者从未见过，不过根据吴荣光手撰的《吴荷屋年谱》可以略加补证。佛山的地方文书较多，也较珍贵，多系

统记述了某一方面的事情。本书利用的《佛山房屋买卖契约》、《佛镇义仓总录》、《佛山街略》、《灵应祠尝产图形》、《真武上帝巡游路径》、《李石泉家书》、《吴荷屋年谱》、《张荫桓日记》、《鹅湖乡事往返尺牍》等，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二是碑刻资料。佛山原有碑刻十分丰富。经过日军侵占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两次破坏，已大量损毁。从1982年起，笔者和蒋祖缘、谭棣华老师与佛山博物馆合作，收集了当时残存的有关经济的碑刻并整理出版，该书辑录碑文78件。而未收录的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碑刻尚多，加上近年来文物普查新发现的碑刻，佛山碑刻总数在150件左右。笔者有幸披阅了这部分资料。三是档案材料。佛山在民国以前尚未设县治，民国4年后南海县始迁来佛山。南海县档案馆收藏了十分丰富的民国时期佛山的档案材料，笔者查阅过其中的151个卷宗。当然，由于本书的重点放在传统城市，因此只是很有限地利用了这批已收集的资料。

本书是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其选题的确定、研究和写作的过程，是在业师杨国桢教授指导下进行的。如果说本书尚有可取之处，那完全是导师的教泽所惠。笔者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叶显恩教授、中山大学的黄启臣教授和暨南大学的李龙潜教授，他们是笔者写作第一篇佛山史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以后又一直勉励笔者从事这一研究，并在各方面给予指导帮助。香港大学的谭棣华先生既是提携笔者步入佛山史研究的开门老师，又与笔者多年合作研究佛山史，对笔者的教益良多。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笔者还特别感谢厦门

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支平博士、副教授郑振满博士和刘森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春声博士和刘志伟副教授，要不是他们对本书寄予的厚望和给予的无私帮助，本书决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个水平。

在本书的研究、写作过程中，笔者还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陈其南博士主持的“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的资助；得到已故中山大学汤明棣教授主持的“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项目的资助；得到英国牛津大学科大卫博士、日本北陆大学西川喜久子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美国西北大学黎志刚博士惠赠的资料。在多次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得到了佛山市文化局局长胡正士、佛山市方志办主任李北翔、佛山市博物馆馆长陈智亮和文博部主任陈志杰、朱培健的诸多帮助；中山图书馆方文珍、倪俊明同志和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诸同志以及南海县档案馆、南海县方志办诸同志给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方便；《黄金时代》杂志社副总编吴志鸿先生为本书的排版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谨此一并致谢！《生活导报》副主编温眉眉女士半年来牺牲了业余时间为笔者录入了绝大部分文稿，并在费用上慷慨资助。没有她的全力支持，本书决不可能以现在这个面貌呈献给读者。

由于笔者学力所限，书中论述容或有误，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 注释：

- [1] 何谓城市？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地理学家弗里德利希·拉泽尔提出最早的城市定义是：“占据一定地区、地处若干条交通线（或其交接点）的永久性人类集居区。”（帕克《城市社会学》P.183）社会学家史若堡提出，都市是“有相当大的面积和相当高的人口密度的一个社区，其中住有各种非农业的专门人员，包括文人”。柏芝尔则认为“任何集居地方其中多数居民是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我们称之为都市”。《现代社会学词典》解释：城市是“人们密集居住并从事非农业的职业的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其人口活动是专业化的，且在功能上互相联系，并由一个正式的政治体系所管制”。（龙冠海《都市社会学理论与应用》P.5）在美国人口统计学上关于城市的标准曾划定在8000居民以上的共同社区，后来规定为4000人，现在则为2500人。（帕克《城市社会学》P.167）由此看来，城市的范围和人口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城市是人类的一种社区，其居民多数从事非农业活动，这是城市有别于农村的主要特征。本书采用这一总的定义。
- [2] 关于中外学者对佛山史的研究，笔者有专门述评。因本书篇幅所限，故未收入。读者可参阅《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第一章第一节“学术史的回顾”（厦门大学博士论文打印本1992年）。又参阅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P.199、P.126（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



## 第二章 佛山的生态环境 与人文环境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从物质结构来说，生态（自然）环境是四大圈层（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有机结合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因此，环境不仅是人类吸取基本生命物质的场所，而且是人类取得生产建设的原料的源泉。

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是相互关联的对立统一。一方面，生态环境是对人类社会长期起作用的重要因素，人类须臾不能或离生态环境而存在，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黑格尔曾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讲的就是自然性质与人的禀赋气质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类在不断地改变生态环境的整体，干预自然界的物质循环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自己。马克思说：“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于他自己的生活的形态上占有自然物